文章编号:1003 - 2053(2026)04 - 0731 - 08

科学传播的仪式观及其理论进路的构建

朱励瑶[1,2],金兼斌[3]
(1.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1408;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3.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基于近年来科学传播领域在传递观取向之外的理论发展,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理论体系,明确了"科学传播的仪式观"这一概念内涵,即仪式观视角下的科学传播可被视作多元参与者围绕传播内容中的科学对象进行经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共建的过程。同时,从多个维度对科学传播的仪式观和科学传播的传递观进行了全面比较。在此基础上,依次沿着个体内水平、个体间/群体内水平及群际水平,系统性地构建起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科学传播的仪式观与科学传播的传递观互为补充,它能够为弥合科学传播参与者间的隔阂、缓解科学与非科学间的文化冲突等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能够为未来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系统且具体的路径指引。

关键词:科学传播;仪式观;科学传播的仪式观;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社会变迁与科学发展,科学传播事业大致经历了科学素养阶段(1960s - 1980s)、公众理解科学阶段(1985 - 1990s)和公众参与科学阶段(1990s至今)[1]。前两个阶段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受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主导,科学传播被视作科学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的单向线性过程[2];其暗示科学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损耗或扭曲,引发了大量在线性方法(linear approaches)下对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特征的考察[3]。在这两个阶段,常人知识(lay knowledge)、非科学文化被视作干扰科学信息传递的"噪音"[4],学界也致力于减少这些"噪音"的干扰。随着科学传播中群体隔阂、文化冲突等问题日益凸显,科学中心主义(science - centrism)受到广泛质疑并逐渐松动,常人知识和非科学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公众参与科学"成为科学传播的主流理念[5]。在公众参与科学阶段,科学传播被视作不同群体传递科学信息的动态交流过程[6]。在对话/参与模型(dialogue/participation model)的主导下,对话方法(dialogic approaches)和文化方法(cultural approaches)发展壮大[7]:前者关注科学家、媒体和公众等群体在科学知识生产和科学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信息传递与协商,其中,"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科学公民"(scientific citizenship)[8]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工具。后者利用话语分析等文化研究方法剖析科学信息表达,将叙事方法、情感表达等视作提升科学信息传递效率的工具[9]。

线性方法、对话方法和文化方法都存在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理论取向:它们都持有"科学传播主要与信息的传递或协商有关"的先验假设[7],并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减少信息损耗和提升信息传递有效性等问题上[10]。秉持传递观的科学传播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内生性的实践困局:传递观中信息传递的"上下游"隐喻暗示了科学家和公众在知识权力结构中的上下位关系,且大力强调信息的有效传递或有损科学传播参与者中信息资源相对匮乏者的权利[11]。因此,尽管"平等"理念在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建设中被大力提倡,但在现实实践中,科学家和公众间的上下位关系仍难以被真正撼动,群体隔阂与文化冲突仍屡屡发生[12]。

为破解这一实践困局,我们需要在"公众参与科学"理念的指引下探索传递观之外的其他理论可能性。学界近年来提出多种传递观之外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承继性的理论脉络,呈现出仪式观的理论

收稿日期:2024 - 12 - 16;**修回日期**:2025 - 01 - 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43)
作者简介:朱励瑶(1996 -),女,博士后,E - mail: zhuliy@ucas.ac.cn。金兼斌(1968 -),男,教授,博士。

取向,为本文对科学传播仪式观的全面论述提供了理论铺垫。下文将概述这些理论观点,明确“科学传播的仪式观”的概念内涵,并与“科学传播的传递观”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参考已有经典理论,构建出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theoretical approaches),为相关科学传播研究实践提供系统的理论框架。

1 理论铺垫:从“作为事件的科学传播”到“科学传播即文化”

十余年来,科学传播领域涌现出一系列传递观取向之外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从“作为事件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event)到“科学传播即文化”(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culture)的承继性的理论脉络。具体而言:玛雅·霍斯特(Maja Horst)和麦克·迈克尔(Mike Michael)于 2011 年提出“作为事件的科学传播”及其相应的“涌现模型”(model of emergence);他们将科学传播概念化为一个事件,该事件本身和促成该事件的各种行动者都是涌现的[13]。该观点对于后续传递观取向之外的理论观点而言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具体来说:首先,其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强调科学传播内容并非有待于完好传递的“成品”,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转译的建构产物;其次,它强调科学传播是有助于身份塑造的文化资源,鼓励研究者关注科学传播中集体身份认知的形成而非仅仅关注科学事实是否成功传递[10]。在此基础上,萨拉·戴维斯和玛雅·霍斯特于 2016 年明确提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的观点,认为科学传播不应被仅仅简化为知识转移过程,而是一种与身份、情感有关的、涉及集体身份和特定社会意义的文化过程[14]。虽然“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与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仪式观的经典理念——“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在语法结构上高度相似,但戴维斯和霍斯特只是将其定位为一种讨论科学传播丰富性的分析框架,尚未表现出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的理论自觉。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者对凯瑞理论观点的吸收:格温多林·布鲁(Gwendolyn Blue)在 2018 年明确倡议将凯瑞的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领域,并提出“科学传播即文化”(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culture)的观点[7]。受布鲁工作的启发,戴维斯等人进一步提出将科学传播视作仪式和集体意义建构过程的观点[10]。虽然上述观点承继最终只止步于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的倡议阶段,但有赖于这些理论积累,本文认为,厘清“科学传播仪式观”的概念内涵并对其进行理论进路构建的时机已经成熟。

2 科学传播仪式观的概念内涵

科学传播的仪式观是凯瑞的仪式观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具体理论应用,在论述科学传播仪式观的概念内涵之前,我们首先概述仪式观的理论内涵。20 世纪 70 年代,得益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阐释理论、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哲学等理论积累,凯瑞基于杜威“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传播一词”的分析对传播研究做出“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划分[15],并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理论建构。凯瑞将“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提出“作为文化的传播”的理念,把传播视作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人们在该过程中完成经验和意义共享、情感共鸣和身份确认,从而“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们行为的文化世界”[15]。其中,凯瑞受格尔茨的影响,将文化视作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认为对作为文化的传播的分析应重在探求意义而非寻求规律[15]。上述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科学传播的新思路:既然文化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之网”,那么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也可被视作与科学相关的集体意义创造的空间;这意味着,科学传播可以被视作世俗的“社会或群体成员之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15]。由此,科学传播便不再只是科学事实的转移,还是特定社会或群体藉以解释世界的“仪式”活动[10]。

作为仪式活动的传播关注“一种从经验中分析得来并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意义”[15],可见“经验”是传播仪式观的核心元素,仪式观视角下的传播实践须通过参与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经验分享行为得以实现。事实上,仪式观之所以能被引入科学传播理论体系,也正是因为二者都强调经验及经验分享的基础性作用:在科学传播中,对科学的解释和意义构建都经由地域性的公民认识论来完成[16];而这种公民认识论正对应着仪式观中所强调的具体情境中的经验[7]。参照凯瑞仪式观的理论要旨,我们把“经验”

作为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的理论切入点,则仪式观下的科学传播可被视作多元参与者围绕传播内容中的科学对象进行经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共建的过程。

科学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把科学置于不同的认识论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各自的认知逻辑倾向,并使它们在科学传播的功能定位和最终目标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传递观或多或少地预设了科学高于非科学的认识论地位以及两者难以通约的认识论关系。这使在科学传播的传递观中存在"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逻辑倾向:科学和非科学之间难以通约的关系使得公众同时接触两者时极易产生心理不适;为消除这种心理不适,公众会倾向于对科学和非科学采取相反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由此达成如图 1 所示的两种认知一致状态(cognitive consistency),其中,"+"和"-"分别表示两元素间的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科学传播传递观对应的缺失模型将公众视作亟待科学填满的空容器[17],在其看来,在成功的科学传播干预之前,公众因非科学相对于科学更日常和具体而将其置于认知主位,即图 1(1)所示的"公众 - 非科学"为"+"而"公众 - 科学"相应为"-"。科学传播研究志在将"科学 - 公众"间的关系转"-"为"+",即:将科学传播的功能定位为改善科学知识、态度和信任赤字[18]。为实现这一目的,在"科学 - 非科学"呈"-"的前提下,科学传播的传递观力图通过科学信息的有效传递,使科学替代非科学占据公众的认知主位,即,"公众 - 非科学"的关系由"+"转"-",从而达成如图 1(2)所示的认知一致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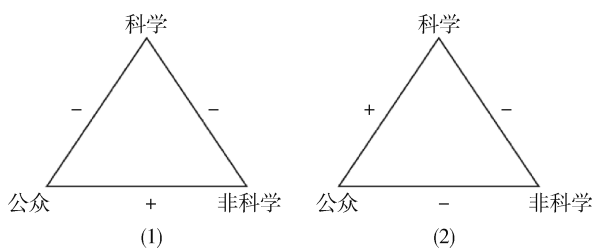

图 1　科学传播传递观对应的认知一致状态

Figure 1　The cognitive consistency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mission 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在仪式观视角下的科学传播中,科学和非科学作为不同类型的人类经验处于平等的认识论地位且二者在个人或群体认知中动态共存、互相作用和整合[12];这在认知逻辑倾向上契合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提出的"认知多相"(cognitive polyphasia)[19]。科学和非科学间的整合使公众能够在日常情境中就科学对象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发展出团结合作的纽带,并促成相关的社会实践行动[20]。故而,仪式观下科学传播的功能可被定位为:其一,基于共享的经验和意义进行身份认证,从而达成和加强群体内的认同、团结与合作;其二,加强群际间对彼此不同群体经验和意义的了解,并经由群体经验的互动,寻求群际间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的可能性,从而促成不同群体对科学议题的共识、减少群体间的隔阂。对应科学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在科学传播本质和功能定位上的差异,二者在评判科学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准、科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关切上也存在区别:传递观中成功的科学传播是受众准确地接收并接受科学信息;仪式观中成功的科学传播是参与者就科学对象达成共享经验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享经验和意义往往呈现出整合科学和非科学的多相状态。与之对应,传递观下科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关切是尽可能降低科学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与扭曲,而仪式观下科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关切则表现为促成群体内或群际间的经验共享与意义共建、增进群体间的互相理解。综上所述,科学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3　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

如上所述,"经验"是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的理论切入点,而凯瑞在仪式观中对经验的论述主要基于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观,且杜威的经验观已经被应用于科学传播的理论开发,如科学传播的"经验模型"(experience model)[12]。有鉴于此,我们从杜威的经验观入手构建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杜威的经验观认为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来自他们与之相关的经验和意义,它们由人们在特定情境中能动地基于先前的经验和意义所塑造,并在形成后影响未来的经验和意义生产[21]。相应地,在科学传播中,人们对科学对象的理解来自他们有关该对象的经验及从中生发的意义,且这种经验和意义的形成呈现动态迭代的特征:人们基于其认知中有关科学对象的既有经验和意义来处理新接触的科学信息,从而形成有关科学对象的新的经验和意义。这一迭代过程持续进行直到相关认知达到相对稳定的

状态。

表 1 科学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view and the ritual 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科学传播的传递观	科学传播的仪式观
隐喻	运输、运送	仪式、典礼
角色	科学家、媒体、公众	参与者
主要实践	对科学信息进行编码 - 传递 - 解码	围绕科学对象进行经验共享 - 意义共建 - 身份确认 - 维系群体内团结/寻求群体间共识
对应理念	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	公众参与科学
对应模型	缺失模型、对话/参与模型	——
认知逻辑倾向	认知失调	认知多相
成功评判标准	科学信息的准确接收和接受	达成共享的经验和意义
功能定位	改善科学知识赤字、态度赤字和信任赤字	维系群体内团结、寻求群际间的科学共识以减少群际隔阂
核心关切	降低科学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与扭曲	促成群体内和群际间对科学对象的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并增进群体间的互相理解

经验和意义属于人们的心理认知范畴，且科学传播仪式观关注的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须建立在个体经验和意义生产的基础上，故而，仪式观下的科学传播可被视作由个体到群际的层层递进的社会心理过程。参考威廉·杜瓦斯(Willem Doise)以解释水平(explanation level)划分的社会心理过程层次框架[22]，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构建将依次沿着个体内水平(intrapersonal level)、个体间/群体内水平(interpersonal/ intragroup level)、群际水平(intergroup level)进行。

3.1 个体内水平

个体内水平的社会心理理论多遵从社会认知范式，旨在探讨个体如何处理信息和构建知识[23]。这些理论能够为个体内水平的科学传播理论进路构建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鉴于经验和意义的形成具有动态迭代的特征，个体内水平的科学传播可被视作：个人激活其既有认知中有关科学对象的经验和意义以处理新触及的科学信息，由此重塑新的有关科学对象的个人经验与意义。个人经验与意义作为科学对象在人头脑中的再现可被视作有关科学对象的个体知识表征(individual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因此，个体内水平的科学传播过程也是有关科学对象的个体知识表征的生成过程。针对这一过程，我们须重点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个体在处理科学信息时会激活哪些既有经验和意义。爱德华·希金斯(Edward Higgins)的知识激活论(knowledge activation)能够为该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抓手。该理论认为知识激活是知识可及性和可用性的互动结果，前者指储备知识被激活的潜质，后者指刺激信息和储备知识间的匹配程度；受环境影响，某些刺激信息能吸引更多注意力，即具备更高的显著性，刺激信息的显著性会经由可用性影响知识激活[24]。知识激活论提醒我们从既有经验被运用的频率和时近程度入手来探索既有经验的可及性，同时还应注意科学信息和既有经验间的匹配程度、特定情境对科学信息显著性的影响。

其二，被激活的既有经验和意义如何重塑科学信息。“隐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能够为分析该问题提供有效的思考角度：人们通过将喻体的意义向本体映射来获得未知的知识[25]；在科学传播中，本体和喻体分别对应个体新接触的科学信息和既有经验，而个体知识表征的生成过程即是隐喻映射过程。概念语境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和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常被用来探讨隐喻映射的机制，前者认为隐喻映射经由本体和喻体在语义、语用和语形上的相似性实现[28]，后者强调隐喻映射依赖与当前认知和沟通目标的相关性[26]。另外，鉴于隐喻映射依靠身体体验[27]，对个体知识表征生成的考察也应关注具身性(embodiment)、具身隐喻(embodied metaphor)等问题。

3.2 个体间/群体内水平

个体间/群体内水平的社会心理理论多遵从社会表征范式[23]，且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在群体共享经验问题上有良好的理论解

释力[28],有鉴于此,我们引入社会表征理论来构建个体间/群体内水平的理论进路。社会表征理论认为,个体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基于其所在社会群体形成被群体规范所修正且为群体成员所共享的经验、意义等认知,即,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19]。个体间的经验和意义之所以能被共享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被共享的经验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个体特异性[12];相应地,群体的社会表征可被视作剥离了个体特异性的抽象表征集[29]。在仪式观视角下的科学传播中,群体成员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交流其有关科学对象的个体知识表征;如图 2 所示,经由这一过程产生的有关科学对象的社会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群体成员个体知识表征的交集。社会表征理论认为科学与群体常识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科学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群体常识或在地经验改造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30]。这种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表现为新旧社会表征的持续性动态迭代[19]。如图 2 所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群体成员调动其既有的群体常识或在地经验改造其接触到的科学信息,从而形成有关科学对象的"社会表征 1.0";"社会表征 1.0"只是科学与常识之间的中间状态,其仍然会被群体常识改造为更新一代的社会表征,如图 2 中的"社会表征 2.0""社会表征 3.0"等;新旧社会表征之间不断迭代,直到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即"社会表征 n.0",其最终成为群体常识的一部分。如图 2 中有一定斜率值的虚线所示,群体常识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虽然迭代中的社会表征也可以反映出群体成员有关科学对象的共享经验和意义,但它们仍然受到具体人际和认知情境的约束;只有被纳入群体常识的社会表征,才算成为真正成为能跨越具体情境的、为群体所共享的经验和意义;群体成员基于此进行身份认证,并实现仪式观所强调的群体维系。因此,图 2 中所示的"社会表征 n.0"可被视作个体间/群体内水平科学传播的目标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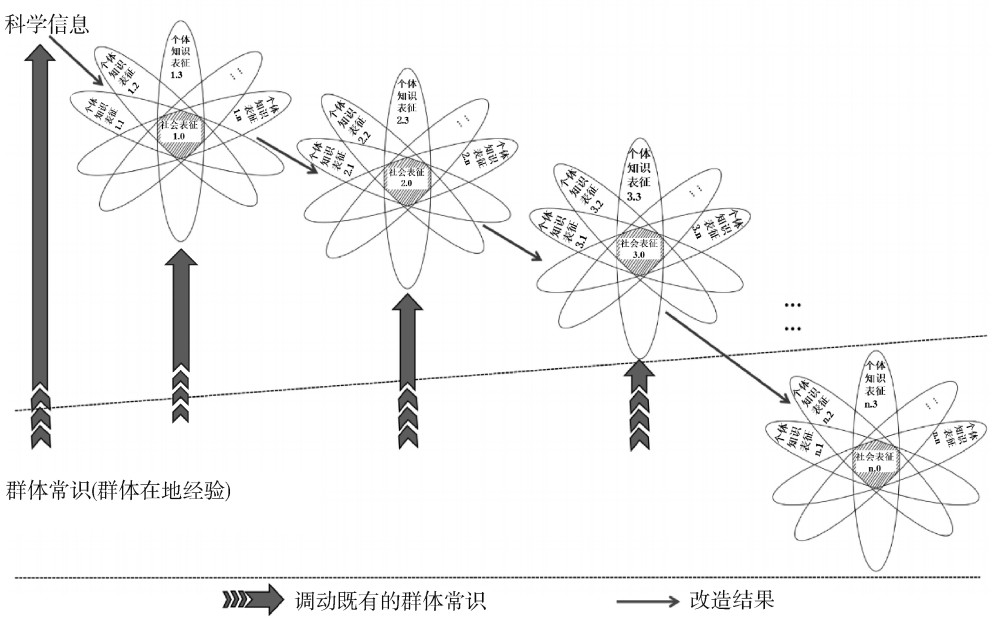

图 2　个体间/群体内水平的理论进路示意图

Figure 2　The diagram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at the interpersonal/ intragroup level

图 2 中社会表征 1.0 的生成及之后的每一次迭代都由具体化(objectification)和锚定(anchoring)两个认知过程推动[31]。具体化指将抽象、复杂的对象转化为具体、相对简单的形式,并最终构成有关表征对象的社会表征实体[31]。科学传播中的具体化既表现在以特定符号代指抽象陌生的科学对象,又表现为在迭代过程中仅保留原有复杂科学信息中的特定要素以达到简化科学信息的目的[32]。该过程提醒我们重点关注在迭代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符号,以及初始科学信息中在多次迭代后仍能保留下来并最终被纳入群体常识体系的信息要素[33]。锚定是将陌生事物纳入群体成员共有且熟悉的先验认知体系

中,从而使之被转化为自身所熟悉的模式[31]。这一过程提醒我们要尤为重视先验知识和先验态度在科学对象解释和意义赋予中的影响。

3.3 群际水平

有赖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科学传播内容在当代科学传播实践中往往能够同时触达多个社会群体。异质群体基于各自不同的群体常识对同一对象生成不同社会表征[19];这些不同的社会表征在维系本群体团结的同时可能会加深不同群体间的隔阂[34]。但在大科学时代,无论是科学知识生产还是科学政策施行都离不开多元社会群体间的团结协作[35];这要求我们促成多群体围绕科学对象的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群际水平的社会心理理论多遵循社会认同范式[23],其中由约翰·特纳(John Turner)等人提出的自我归类理论(self - categorization theory)能够解释多群体异质观点的处理问题[36]。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人们遵循"元比较原则"(meta - contrast principle)处理异质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自我和他人进行群体归类,具体而言:如果一些个体感知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性高于他们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相似性,那么他们就倾向于将彼此归为同一个社会分类,由此,分散的个体沿着特定的相似性维度形成一个群体[36]。群际传播可视作多群体社会表征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19]。不同群体社会表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各自的中心核(a central core)部分,该部分包含对应群体最基本的价值观和规范,决定了所在社会表征的性质,是群体成员识别群体特征、进行身份识别和群体归类的依据;社会表征除中心核外的部分为边缘带(peripheral elements),其在多群体社会表征互动的过程中发挥吸收外部观点并适应社会外部环境变迁的作用[37]。不同群体社会表征边缘带上的认知元素存在共容的可能性,不同群体可在各自社会表征的边缘带处达成群际共识[38]。

在群际水平的科学传播中,来自不同群体的参与者互相交流他们有关科学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意义,比较他人与自身认知的异同,并将持有相似认知的参与者视作自己的同类。鉴于群体间相似的认知更可能存在于各群体社会表征的边缘带上,这些不同群体的科学传播参与者能够沿着边缘带认知元素中蕴含的相似性维度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并基于边缘带中相似的认知元素生产有关科学对象的共享经验和意义,即社会表征。至此,围绕科学对象进行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的科学传播问题已从群际水平降维至个体间/群体内水平,则接下来的分析可依据上文所述的个体间/群际水平的理论进路进行。

人们倾向于对其所在且所认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持支持和正面的态度[39],因此,当异质群体的参与者沿着科学对象的特定维度形成新的群体后,他们更可能就该维度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支持,并继而在科学传播实践的特定维度上展开合作;相应地,这些参与者就特定维度生产出的社会表征也将成为促进交流、维系团结合作的有效工具。在群际水平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异质群体参与者的自我归类行为和边缘带认知元素的相似性聚类应该受到重点关注。对前者而言,人们乐意使用特定相似性维度的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我归类的结果[40]。这提醒我们在科学传播研究中注意对比参与者在不同相似性维度上归类倾向的强弱并据此识别关键的相似性维度。对后者而言,不同的相似性聚类算法各有其适用的数据性质和应用情境,且可能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这提醒我们在具体研究中综合考虑待聚类认知元素的规模、分布特征、噪声和异常值等问题,并结合具体情境谨慎选择适当的相似性聚类方法。

4 总结与讨论

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须回应并服务于当下的现实问题,当下科学家、科学传播者、公众之间的群体隔阂、科学和非科学间的文化冲突正是亟需科学传播领域解决的现实难题。当前盛行的对话方法和文化方法虽然都力图解决这些难题,但其传递观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们达到预期效果。时至今日,科学传播学界已经在传递观之外承继性地发展出从"作为事件的科学传播"到"科学传播即文化"的理论脉络;本研究沿着这一脉络更进一步,回应布鲁等人将仪式观引入科学传播的倡议,首次明确了"科学传播的仪式观"的概念内涵,即科学传播的仪式观是将科学传播视作多元参与者围绕传播内容中的科学对象进行经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意义共建的过程。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我们还从多个维度全面比较了科学传播的仪式观和科学传播的传递观。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次沿着个体内水平、个体间/群体内水平、群际水平构建起科学传播仪式观的理论进路;这三种水平的理论进路分别遵从社会认知范式、社会表征范式和社会认同范式。值得注意

的是,群体是经验共享和意义共建的最小单位,个体间/群体内水平是该理论进路的重心所在,表现为:群体成员个体知识表征的交集构成群体社会表征,科学传播问题由此从个体内水平递进至个体间/群体内水平;不同群体成员基于边缘带认知元素的相似性进行自我归类,科学传播问题由此从群际水平降维至个体间/群体内水平。

科学传播的仪式观和科学传播的传递观之间并非绝对互斥或截然对立,提出科学传播的仪式观也绝非意味着对科学传播传递观的否定。事实上,以科学作为传播对象的科学传播与传递观持有的实证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适配性[41],这既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传递观能够主导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原因所在,又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传递观在当下和未来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理论地位。具体而言,科学传播的传递观在特定科学传播场景和议题中仍然具有极强的理论优势,如:对及时性和准确性有较高要求的应急科普、非科学和公众常识较少涉及的"小科学"议题等。事实上,我们提倡的是一种科学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相互补充、互相制衡的平衡视角:既要避免因过分依赖传递观而陷入科学绝对主义(scientific absolutism)从而加深群体隔阂、助长科学的殖民主义(scientific colonialism)等不良倾向,又应警惕因过度奉行仪式观而忽视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陷入科学相对主义(scientific relativism)的陷阱。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科学传播仪式观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进路作为科学传播传递观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拓展研究者的思考角度,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效且系统的路径指引。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仪式观也是仪式观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具体理论应用,其有力地拓展了仪式观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边界。另外,对于科学传播实践而言,本文的理论观点能够为弥合群体隔阂、缓和科学与非科学间的文化冲突、应对科学的殖民主义等现实难题提供新颖的理论指导。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科学传播仪式观的内涵论述和理论进路构建都建立在对已有理论的演绎上,它们仍有待于未来相关科学传播研究实践对其进行完善;此外,如何平衡科学传播传递观和科学传播仪式观以避免不当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也亟待未来研究实践在具体议题和具体情境中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参考文献:

[1] Laura B, Yeoman K.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Scientists [M].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2012: 9 - 17.

[2] Bucchi M. Science i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4: 107 - 125.

[3] Weigold M F. Communicating sci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1, 23(2): 164 - 193.

[4] Van Dijck J. After the "two cultures" toward a "(multi) cultural" practi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3, 25(2): 177 - 190.

[5] Bucchi M. Of deficits, deviations and dialogues: Theorie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 Bucchi M, Trench B.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 London: Routledge, 2008: 71 - 90.

[6] Gregory J, Miller S. 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 [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247.

[7] Blue G.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culture: Foregrounding ritual in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41(2): 243 - 253.

[8] Irwin A. The politics of talk: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ew" scientific governance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6, 36(2): 299 - 320.

[9] Finkler W, Leon B. The power of storytelling and video: A visual rhetoric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18(5): A02.

[10] Davies S R, Halpern M, Horst M, et al. Science stories as culture: Experience, identity, narrative and emotion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J].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18(5): A01.

[11] Wynne B.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 - lay knowledge divide [A]. Lash S, Szerszynski B, Wynne B.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Towards a New Ecology[C]. London: Sage Press, 1996: 44 - 83.

[12] Halpern M K, Elliott K C. Science as experience: A deweyan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22, 30(4): 621 - 656.

[13] Horst M, Michael M. On the shoulders of idiots: Re - think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event" [J]. Science as Culture, 2011, 20(3): 283 - 306.

[14] Davies S R, Horst M. Science Communication: Cul-

ture,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M]. London: Springer, 2016: 1 – 28.

[15]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Carey J W.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M].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16] Jasanoff S.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 – 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4: 274 – 281.

[17] Weingart P, Joubert M, Connoway K.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Origins, motives and impact in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science policy [J]. PloS one, 2021, 16(7): e0254201.

[18] Hildering P, Consoli L, Van Den Born R. Denying darwin: Views on science in the rejection of evolution by Dutch Protestants [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3, 22(8): 988 – 998.

[19] Moscovici S. Why a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A]. Deaux K, Philogène 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Bridging Theoretical Traditions [C].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8 – 35.

[20] Jovchelovitch S. The rehabilitation of common sense: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cience and cognitive polyphasia [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08, 38(4): 431 – 448.

[21] Hohr H.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by John Dewey revisited: Conceiving, feeling and "enliving" [J].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013, 32: 25 – 38.

[22] Doise W.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 17.

[23] 方文. 文化自觉"的阶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社会心理学系列》总序[J]. 开放时代,2010(5):146 – 158. Fang W. The ladder of "cultural self – consciousness" [J]. Open Times, 2010(5): 146 – 158.

[24] Higgins E T.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nd salience [A]. Higgins E T, Kruglanski A W.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C].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6: 133 – 168.

[25] Gentner D, Bowdle B. Metaphor as structure – mapping [A]. Gibbs Jr R W.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9 – 128.

[26]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163 – 171.

[27] Gibbs Jr R W, Lima P L C, Francozo E. Metaphor is grounded in embodied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 36(7): 1189 – 1210.

[28] Wagner W.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paradigm [J].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6, 35(3): 247 – 255.

[29] 赵蜜. 社会表征论:发展脉络及其启示[J]. 社会学研究,2017(4):218 – 241,246. Zhao M.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inspirations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4): 218 – 241,246.

[30] Bangerter A, Heath C. The mozart effect: Tracking the evolution of a scientific legend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4, 43(4): 605 – 623.

[31] Höijer B.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J]. Nordicom Review, 2011, 32(2): 3 – 16.

[32] Courvoisier N, Clémence A, Green E G. Man – made black holes and big bangs: Diff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to everyday thinking [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3, 22(3): 287 – 303.

[33] Rateau P, Moliner P, Guimelli C, et al.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A]. van Lange P A M, Kruglanski A W, et al.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C]. London: Sage Press, 2011: 477 – 497.

[34] Aminzade R, McAdam D.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A]. Aminzade R.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 50.

[35] Price D J. De Solla.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92 – 116.

[36] Turner J C, Reynolds K J. Self – categorization theory [A]. van Lange P A M, Arie W, Kruglanski E, et al.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C]. London: Sage Press, 2011: 399 – 417.

[37] Abric J – 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Deaux K, Philogène 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Bridging Theoretical Traditions [C].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1: 42 – 47.

[38] Moliner P, Abric J C. Central core theory [A]. Sammut G, Andreouli E, Gaskell G, et al.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3 – 95.

[39]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4, 13(2): 65 – 93.

(下转第 779 页)